



四十一年在长春一汽 长春 50年届 林水俊 1

林水俊，印尼归侨，祖籍福建省龙海县。

1928年11月，林出生在印尼爪哇岛文池兰镇，1950年7月乘太古轮船公司的岳州号回国。同年考取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53年毕业被分到一汽。

在为一汽效力41年间，他在生产科做过技术员、计划员，在设计处担任过工程师、道路试验室副主任和主任，期间被下放到总装配分厂劳动两年。

1980年，林水俊任长春汽车研究所整车研究室主任。1982年后，历任汽车研究所副所长、海南汽车试验站站长、中国汽车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1986年任汽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1993年底退休。可以说，他这一生都没离开过整车试验。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林水俊主要主持三项与试验室相关工作：一是长春汽车试验场的建设；二是海南湿热带汽车试验场的建设；三是建



巴中50年届林水俊

设中国汽车质量检测中心。

2015年7月11日，87岁的林水俊在位于长春的花园酒店接受本次访谈，为我们还原如何建成中国最早试验场的坎坷经历。

踏上归国路

我祖籍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1928年11月，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爪哇岛文池兰镇。小学和中学都在华侨学校念书，因此一直是念“中国书”。

学校有外语课程，所以当地话我会

讲，英语也会讲。印尼以前是荷兰的殖民地，我也大致了解一些荷兰单词。

1950年我决定回中国。为什么？我对中国历史非常关心。不夸张地说，我学到的历史知识和所了解的事情，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主要得益于马来西亚和印尼当地的华侨报纸以及一些中国历史演义和书籍。

年轻时我最恨英国人和日本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首先侵略中国，其次是日本。当时殖民地的人都怕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是“东亚病夫”。我们这些海外华侨被认为是海外孤儿，所以都希望中国强大，这样在国外才有社会地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多华侨，包括第二代华侨和一些青年学生都先后回国。当年我18岁，很羡慕那些能回国的人。但后来回国同学写信讲，他们在国内很失望。抗战虽然胜利，国民党却没感觉到我们是战胜国，美国人仍在中国作威作福，大家都感到很彷徨。

战争年代，人们颠覆流离。从1941年底

日本占领印尼到1948年，因没生意可做，家庭破产，我跟父母分散了六七年。日本投降后，印尼要独立，又跟荷兰打仗，所以生活极其不安定。

上大学时我年龄偏大，大多数同学出生在1931年前后，比我晚三四年。其实我入学很早，中间还跳过两次级。到1948年才插班念高二年级，1950年毕业，正赶上国内解放战争。为什么抗战胜利了，又要打内战，很多在国外的人都不理解。

有件事情使我们下定决心要回国。解放军打渡江战役时，两艘英国军舰帮国民党，却被共产党的大炮打跑。这在国外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用中国武器把外国军舰打跑，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家都非常振奋。

1950年7月12日，我们79名学生乘坐太古公司的轮船岳州号离开雅加达海港，7月30日抵达天津港，前后共18天。

我们坐船直接到达天津，有一张华侨中学生的合影照片，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接见并亲自宴请我们。我们一行人大约18、19岁，还比较幼稚，受到（黄敬）市长出面接待并宴请真

受宠若惊，感到非常温暖。

事后听黄敬市长讲，当时回国学生很多，我们是第一批有组织回国的学生。这件事惊动了国内外，我们的船要经过台湾，国民党想把船扣留在台湾。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指示黄敬市长：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告诉太古轮船公司，必须保证学生安全抵达天津港，否则一切后果太古轮船公司承担。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清楚，我们的船到底是经过台湾海峡，还是绕过台湾海峡回国的？

我还记得黄敬市长跟我们开玩笑，他说他会讲印尼话，但他把“猪BABI”说成了“仆人BABU”，引得大家大笑。

我们在天津待了两天，8月1日参加建军节。天气特别热，我们都穿着短装，受邀坐在主席台上。8月2日我们到北京，中央侨委安排我们住在东城区王大人胡同。

8月5日，我们在北京参加高考，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只能凭借原来基础参加考试。除我们外，还有从香港到北京的一批华侨学生，他们来自马来西亚、印尼、香港和泰国。我们两班人马在北京会师，200多人参加北京



一汽实验场